

十七、十八世紀歐洲主要的《中庸》譯本

——兼論早期來華耶穌會士對儒學典籍的西譯及其刻印出版活動

羅 瑩

[提 要] “四書”域外傳播史一直是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課題，本文經由梳理十七、十八世紀歐洲主要的《中庸》拉丁文譯本及其轉譯本，試圖呈現清初來華耶穌會士譯介儒學典籍的具體情況，以及他們在中拉雙語譯本刻印出版方面所進行的實踐及其成果。

[關鍵詞] 《中庸》 耶穌會士 雙語合刻本

[中圖分類號] B97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2) 04 - 0000 - 09

一、 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翻譯“四書”的活動

1624年，時任耶穌會中國副會省省長的李瑪諾（Manual Dias）制定了來華傳教士在語言文化訓練方面的四年“研習計劃”（ratio studiorum），其中明確規定了來華傳教士都必須學習“四書”、《尚書》等著作。^①事實上，來華耶穌會士的“四書”翻譯活動早在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利瑪竇（Matteo Ricci）時期就已開始。據利瑪竇與耶穌會的通信記載，為了給剛來華的耶穌會神父石方西（Francesco de Petris）教授漢語，他從1591年12月到1593年11月在韶州譯成了“四書”並打算將它們寄回義大利的耶穌會總會^②，德禮賢神父（Pasquale D’Elia）和孟德衛（David Mungello）都認為利氏的“四書”翻譯可能成為後來幾代耶穌會士集體譯介“四書”的底本，並最終被潤色、完善成為《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③有關“利瑪竇譯本”藏於何處，學界迄今尚無定論，但很可能它只以手稿形式傳世，後來經他人多方傳抄得以留存並為新來華的傳教士所用。而倫貝克（Knud Lundbaek）則提到“四書”翻譯最早可能始於羅明堅翻譯了《大學》的第一部分並收錄在1593年Antonio Possevino在羅馬出版的*Bibliotheca Selecta*一書中。^④無論如何，現在可以完全肯定的是：耶穌會士“四書”譯介成果主要體現在1662~1711年間的四個刻印刊行拉丁語譯本當中，此後在歐洲還出現了一些由拉丁文譯本轉譯而來的其他歐洲語言譯本。其中，在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影響較大的兩個《中庸》拉丁文譯本是：《中國政治道德學說》（*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Guamcheu-Goa, 1667/1669）以及《中國哲學家孔子》第二冊（*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 Liber Secundus, Paris 1687)。

二、十七、十八世紀歐洲主要的《中庸》拉丁文譯本及其轉譯本

1. *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中國政治道德學說》——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藏本)^⑤

該書譯者是殷鐸澤，他在 1667、1669 年分別於廣州和果阿刻印了該書的前後兩部分。該拉丁文譯本共有 32 頁（其中最後兩半葉皆為空白），封面上標注了譯者的姓名及身份：殷鐸澤，耶穌會士，來自於義大利西西里並在（主的神聖之）光的照耀下所著。第二頁上則說明了此書的使用者為耶穌會在華第五省值會的會士們，即該書是由他們負責翻譯校對以及發行；接下來從上到下、從左到右依次標注了 4 名批准此書發行的耶穌會士的姓名：郭納爵（Ignatius à Costa）、劉迪我（Iacobus Le Faure）、利瑪弟（Matthias à Maya）、成際理（Felicianus Pacheco），以及對該書同時進行集體鑒定的 12 名會士的名字：何大化（Antonius de Gouuca）、聶伯多（Petrus Caneuari）、潘國光（Franciscus Brancato）、李方西（Io. Franciscus de Ferrariis）、洪度貞（Humbertus Augeri）、聶仲遷（Adrianus Grelon）、穆迪我（Iacobus Motel）、畢嘉（Io. Dominicus Gabiani）、張瑪諾（Emmanuel Georgius）、柏應理（Philippus Couplet）、魯日滿（Franciscus Rougemont）、恩理格（Christianus Herdtrich）。每個人名字的下方都標出各自的所屬耶穌會會院的所在地。

第三頁是當時在南京被任命為副省會長的成際理所寫的一篇負責人的許可信。在聲明中他寫道：按照耶穌會在羅馬的總會長（Superior General Giovanni Paolo Oliva）委託給我的權威，我給予耶穌會士殷鐸澤神父一個許可，讓他來負責出版《中國的政治倫理學說》一書。這部著作首先由郭納爵神父，再由劉迪我神父，最後是利瑪弟神父，經由這三位前輩而被我們耶穌會確認，另外還有 12 位我們耶穌會在中國很有名的神父的鑒定和批准。我們認為這本書值得出版。在這些人的推薦之下，我親手簽名並給這蓋上代表我職責的印章。最後他指出該聲明於 1667 年 7 月 31 日寫於廣州，也就是說從此時起這本書正式獲得刊印發行的資格。根據榮振華的記載：1666~1669 年成際理神父在南京擔任副省會長，這與他在聲明中的陳述是相符的。1667 年 12 月 8 日至 1668 年 1 月 26 日他在廣州召開了所有被放逐的傳教士們有關禮儀和本地神職人員的大會，隨後為了向教宗呈遞 1668 年 1 月 26 日這次著名會議上選舉出來的中國傳教會護教聖者的結果，殷鐸澤被指派為在華耶穌會赴羅馬向教宗報告會務的代表。他於 1668 年 9 月 3 日抵達澳門並於 1669 年 1 月 21 日離開澳門趕赴羅馬，最終將選舉結果送到羅馬並獲得教宗的正式核准。而據費賴之考證，殷鐸澤的《中庸》譯本是他在 1667 年“先刻一部分於廣州，後二年續刻於果阿，故亦稱為果阿本，後附《孔子傳》”。即該書後半部分的刻印是殷鐸澤從澳門回羅馬的航行中、途經果阿並於此地完成的。

第 4 頁是署名殷鐸澤的一篇編者手記，提及他翻譯該書的目的在於：更方便、更快速地使自己的傳教工作得到接納，他也相信該書的出版是基於它可以在傳教方面帶來好處（*ut scilicet publico Missionis bono propius ac citius consuleretur*）。殷鐸澤稱“中庸”為堅定而平常的金律（*CHUM YUM, MEDII scilicet, seu Aureae Mediocritatis Constantia*），認為這本書是生活在曲阜的孔子的孫子（子思）從自己父親那裡繼承而來並把這本書公佈，其中也增添了自己的某些解釋，子思希望將孔夫子這位道德突出的老師的思想告訴世人，讓他的自然理性的光芒照亮罪惡的陰暗，猶如東方破曉般的恩寵，照射出真誠之光，照亮並指明這塊土地上的福音之路（*naturali lumini*

vitiorum tenebris offuso, ceu auroræ beneficio, eam veritatis lucem subministrat, quæ Soli eangelico præluceat, viamque pandat)。但是，儘管子思為《中庸》融入了自己的解釋，這本書還是顯得有些殘缺不全和意義不明。殷鐸澤提到為了幫助讀者解決閱讀中可能遇到的困難，他參照中國官學為《中庸》所做的注解，往拉丁譯文中增添了自己的一些解釋。此外，在手記的末尾，他特別對這本書的閱讀順序以及其中使用的一些符號進行了說明，比如中文和拉丁文黑體字、斜體字、標碼、頁碼和閱讀時的順序等，他也提到了漢語語音的問題。他指出，因為口音的不同，所以漢語在聲調上是有差異的，初來華傳教的傳教士（初學者“tyro”）可以通過記憶書中所記載的這些發音獲得指導。他也提到了這本書的後半部分是在果阿刻印（前半部分是在中國刻印的），其中的修飾性文字被劃在括弧裡的，這是為了使文章的意思更清楚。其他比較小的文字也是基於這個原因而被如此刻印。在解釋文中 f.p.§符號時，他清楚地解釋了 f(folio 面)、p(pagina 頁 1/2)和§(paragaphus 段落)的意義。殷鐸澤也明確指出他在此使用的中文文本是《中庸》的南京版本，作者是朱熹，這本書一般被稱為《四書集注》(iuxta ordinem impressionis Nan-kim editæ, Authore Chu-Hi, qui liber vulgo dicitur Su-Xu-çie-chu)。

該書的正文部分：前 12 頁屬於在廣州刻印的部分（見左圖），該部分的刻印採用中式的刻印方法，四周單欄；白口，單線魚尾，版心上方書《中庸》二字，下方則標有頁數；左頁書眉中央書有手寫拉丁文“Lib.2. Chum-yum”（第二本書 中庸）的字樣，右頁書眉中央則寫著“Versio Literalis”（逐字翻譯，即直譯之意）。每半頁的左側為拉丁譯文，行數和每行字數不定。上方有標號的黑體拉丁文是對《中庸》逐字直譯的譯文，斜體無標號的拉丁文是為了幫助理解而增加的譯文（到果阿部分，作者增譯的部分則被明顯放置於括弧中），排列順序為從左到右、從上到下。半頁的右側是《中庸》的中文原文，半頁計四行漢字，行二十字（到果阿版時，漢字部分的排列出現明顯變化，半頁計四行漢字，行十七字），文字的排列順序是從上到下、從右到左，黑體的中文實詞在其右上方都有標號，與左側的拉丁譯文一一對應，沒有標號的多為無實在意義的虛詞，如“之”“也”“乎”等，每個漢字的讀音標注在該漢字的右下角。每頁上的文段以雙圓圈分隔開，圈中有 f.p.§的符號，標明了這些語句在原書中（在南京刊行的朱熹的《四書集注》）的位置，f 表示《四書集注》裡該語句所在中式對開頁上的頁碼，p 為該文字位於對開頁面上的哪一半頁；§ 則為該文在原書中所在段落的標記，有時是一整個章句的翻譯，有時只是一句話的翻譯。^⑥

後面 14 頁屬於果阿刻印部分（見右圖），版面情況與廣州版大致一樣，唯該版版口無單線魚尾，中文部分排列有變，半頁計四行漢字，行十七字（這也成為判斷廣州版和果阿版如何分界的一個明顯例證），而拉丁譯文與中文原文之間亦多一豎線將其隔開，頁面上隱約可見下一頁的文字，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

1. 據陳倫緒神父的推測這可能是單頁雙面刻印造成的；

2. 由於書仍是中式裝訂，因而我認為可能是由於果阿版的紙質較廣州版的要稀薄，且刻印者出於時間緊迫、急欲完成等原因，在墨印未幹之時即將之對折致使半頁上字的墨印都滲透顯現到另一半頁上。半頁上無論漢字抑或字母不再有黑體斜體之分，且右側漢字的讀音和數字位置與廣州版相反，讀音在上而數字在下，且沒有雙圓圈分隔而只有簡單標明語句位置的符號，為幫助理解而附加的部分譯文改在括弧中標出。

我猜測果阿版的刻印可能比較匆忙的原因還在於：一方面裡面的版面組織排列比起廣州版顯得略為粗糙、簡易；另一方面是裡面的數字標號有部分出錯，這種情況在廣州版中並沒有發生。

而在翻譯拉丁文的過程中，我還發現果阿部分的拉丁文單詞大量採用了 17 世紀的拉丁文單詞縮寫規則，這在廣州版中也沒有出現過，由此可見該書後半部分在刻印時間上的緊迫和刻印時的倉促。^⑦而這些與費賴之所記載的情況也可以互相解釋：殷鐸澤“先刻一部分於廣州，後二年續刻於果阿”。在還沒有來得及完成全書刻印就因耶穌會的派遣而匆忙偷渡出境——此次動身的時間可能也出乎殷鐸澤本人的意料，並不是由他自己事先所能決定的，對此的證明就是書中廣州刻印部分結束的地方是在一句話的中間，而果阿版開篇就是接著刻完了這句話的原文和拉丁譯文。當然，這也有可能是由於木板整版刻印和出於經費等方面的考慮，為了刻印的方便和節省印刷費用和時間，在必須動身之前恰好結束一個版面兩個半頁的印刷，等到下一個歇腳處再開始下一版面的刻印。從而導致在一個版面結束之處，雖然在這裡一句話還沒印完，刻印工作還是截然停止了——繼而在返回羅馬的航行中途經果阿，殷鐸澤在此地匆忙修整並完成了後一部分刻印，並攜帶該書作為耶穌會在華活動的一項成果趕回羅馬作為中國副會省的代表進行匯報。

經過校對耶穌會檔案館所藏、只在序言上標明了“1667 年刻於廣州”的《中國政治道德學說》和國圖縮微處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所藏的《中國政治道德學說》拉丁文版^⑧，可以發現兩個版本在封面、許可聲明、作者序言和《中庸》一書的翻譯上完全相同，只是後者在《中庸》譯文之後還多了 8 頁的拉丁文《孔子傳》，並且在最後一頁上加蓋了殷鐸澤的印章以及“1669 年 10 月 1 日於果阿在(天主的)光照之中再次確認這本著作獲准出版”(Goae Iterum Recognitum, ac in lucem editum. Die 1. Octobris. Anno 1669. SUPERIORUM PERMISSU.) 的字樣。因而我認為耶穌會檔案館所藏的應該是殷鐸澤原著的一個殘本，原因何在現還不能猜測。而據費賴之的記載，這本拉丁文的《中國政治道德學說》也應該是“後附《孔子傳》”的。^⑨

2. *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中國政治道德學說》)——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藏本

該書在內容及排版上與上述耶穌會藏本完全相同，但最後多處八頁拉丁文《孔子傳》。^⑩倫敦大學的藏本是最為符合費賴之、陳倫緒等人所作文獻記錄的完整版本。

3. *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¹¹ (《關於各種奇異旅行的報導》)

1672 年，當時法國皇室圖書館館長 Melchisédech Thévénot (1620~1692) 在巴黎出版了他著名的遊記報導，該書第二卷第四部分收錄了《中國政治道德學說》一書的全部拉丁文翻譯，而原書的中文和注音部分則被全部去掉；在拉丁譯文之後附有一個法語的簡介 (AVIS)，介紹了殷鐸澤在“編者手記”中所說的主要內容以及《中庸》一書的作者和主要思想，似是為了方便當時讀者的閱讀理解而寫；之後是從拉丁語轉譯成法語的《孔子傳》(La Vie de Confucius) 以及節選《中庸》的部分拉丁譯文轉譯成法語 (Version de quelques endroits du second livre Confucius)。該法語轉譯版的《中國政治道德學說》遠比殷鐸澤中拉合刻的原書在歐洲更為知名、影響更大。

4.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¹² (《中國哲學家孔子》)

《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為西式精裝對開本，在巴黎經由活版印刷 (Parisiis : ex typographia Andree Cramoisy Parisiensis typographi) 於 1687 年出版。該書題為《中國哲學家孔子，或者說是用拉丁文來展現中國的智慧》(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標題下面是四位耶穌會譯者的署名：殷鐸澤、恩理格、魯日滿和柏應理。

扉頁上特別標出該書是奉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之命 (JUSSU LUDOVICI MAGNI)，於法國宮廷

圖書館面世 (E BIBLIOTHECA REGIA IN LUCEM PRODIT)。或許由於該書出版的資助方是法國皇室，因而與在華耶穌會通常的出版慣例不同，書中以一封署名柏應理、以個人名義撰寫的致法王路易十四的感謝信，取代了通常耶穌會在出版物扉頁標注出的“值會”名單（即主持該書出版、校對審核工作的主要負責人）、集體鑒定者的名單，以及由會省負責人撰寫並署名的出版批准聲明。此外，扉頁上也標明了該書的出版人姓名 (Daniël Horthemels)、詳細的出版地址 (via Jacobaea) 以及出版時間 1687 年 (M. DC. LXXXVII. CUM PRIVILEGIO REGIS)。

《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的內容包括：柏應理所寫的《致偉大虔誠的基督教君主路易十四函》 (*Ludovico Magno Regi Christianissimo Epistola*)、殷鐸澤與柏應理合著的《初序》 (*Proëmialis Declaratio*)、殷鐸澤所作《孔子傳》 (*Confucii Vita*) 並附孔子像、《大學》 (*Liber Primus*) 《中庸》 (*Liber Secundus*) 《論語》 (*Liber Tertius*) “三書”的拉丁文全譯本、柏應理所作的《中華君主統治歷史年表》 (*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 和《中華帝國及其大事紀》 (*Imperii Sinarum et Rerum In Eo Notabilium Synopsis*)，並附柏應理繪製的中國地圖。由於受到當時歐洲刻印技術水準的限制，“三書”手稿譯文中所有的漢字在印刷出版時都被取消，只保留了拉丁譯文部分，所以最終的成書中沒有出現任何漢字。

5. *La morale de Confucius, Philosophe de la Chine*¹³ (《中國哲學家孔子的道德》)

1688 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作者匿名。該書為西式 8° 版本 (約為 10×15 釐米，封面見右圖)，書中收錄了《中國哲學家孔子》的法語節譯本，語言通俗易懂。該書主要內容包括：引言 (AVERTISSEMENT) 和正文。正文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紹中國歷史、古代歷史人物以及哲學思想 (*De l'Antiquité et de la Philosophie des Chinois*)；第二部分是《大學》、《中庸》和《論語》三書的節譯 (*Recueil des Ouvrages de Confucius*)；最後還翻譯了 80 條中國哲學的“座右銘” (MAXIMES)。

7. *Notizie Varie dell'Imperio della Cina e di Qualche Altro Paese Adiacente con la Vita di Confucio*¹⁴ (《各種關於中華帝國及其相鄰國家的記載，並附孔子傳》)

該書的編著者為 Jacopo Carlieri，1697 年出版於佛羅倫斯。書中收錄了殷鐸澤所作的拉丁文《孔子傳》和《中庸》譯文。

8. *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¹⁵ (《中華帝國六經》)

該書譯者是比利時來華耶穌會士衛方濟 (François Noël)，1711 年出版於布拉格。書中收錄了“四書”以及《孝經》、《小學》的全部拉丁譯文，是歐洲現今可見最全的“四書”西文刊印本。衛方濟書中的《中庸》翻譯——其他“三書”的譯介情況也是如此——以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為底本：開篇是題為《致讀者》 (“LECTORI”) 的譯者手記，簡介《中庸》一書的書名、作者、成書史及其在後世的影響；此後是一篇後世闡釋者為《中庸》一書所作的序言 (“Commentarii in Immutabile Medium PROOEMIUM”) 及《中庸》的全文翻譯 (“IMMUTABILE MEDIUM”)。衛方濟在這裡幾乎是逐字逐句地翻譯了朱熹的《中庸章句序》及《中庸章句》，並在部分重要章節也加入張居正的解釋。該書的出版對十八世紀德國啟蒙思想家沃爾夫 (Christian Wolff) 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9. *REGIOMONTANI ... MUSEUM SINICUM In quo Sinicae Linguae et Literaturae Ratio Expliatur*¹⁶ (《漢語博覽》)

該書作者是巴耶爾 (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1730 年出版於聖彼德堡，書中收錄了殷鐸

澤所作的拉丁文《孔子傳》。

此後，18世紀來華的法國耶穌會士也對中國古典著作的翻譯傾力頗多，只是比起“四書”，他們更為重視“五經”的譯介。

三、來華耶穌會士譯介儒學典籍的動機以及刊印實踐活動

來華耶穌會士對“四書”的西譯並在歐洲將其譯著刊行，一方面是將這些譯著作為其在華傳教的成果，展示給羅馬教會；另一方面，考慮到這些譯作的主要受眾是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民眾以及那些即將從歐洲來華的新傳教士，其翻譯動機結合歷史背景來看，可能有：

1. 殷鐸澤、柏應理等人都是建立中國本土教會的積極倡議者，他們先後作為“中國副會省差會代理人”（*Sinensis missionis procurator*），前往羅馬向教皇匯報教區工作。他們在旅行中都攜帶了大量中文書信，其中就包括耶穌會士翻譯的“四書”刊印本，其目的在於：請求教宗批准耶穌會可以在華吸納、培養中國本土神父並用中文做彌散，只有這樣耶穌會才能長久地保存在華福音傳播的成果，而不至於因為此起彼伏的教案致使外國神父被迫遣送出境，導致福音工作的中斷乃至夭折；而通過拉丁譯文來展現儒家的豐富思想，可以有力地證明：歸化如此一個有著悠久深厚的文化、注重倫理道德修養並且有豐富政治智慧的民族，將會對基督宗教的弘揚有莫大的光耀作用；

2. 向西方民眾介紹中國儒家的“政治道德”思想，一方面是為借此著作顯示耶穌會在華傳教的成果、對中國文化的深入瞭解，並在歐洲為在華耶穌會士的傳教方針、尤其是為耶穌會在禮儀之爭中受到的責難辯護，顯示耶穌會寬容中國民眾祭祖祭孔的依據以爭取歐洲民眾的支持；另一方面也為激勵更多的年輕人加入耶穌會以及招募更多來華宣揚福音的耶穌會士；

3. 吸引歐洲貴族以及知識分子對其在華傳教事業的關注，從而為在華傳教活動籌集更多的資金、贊助。

在雙語書籍的刊印出版史上，殷鐸澤扮演著中拉雙語排版及刻印出版方面的先驅角色。儘管據 Oskar Nachod 考證，早在 1570 年於葡萄牙科英布拉（Coimbra）出版的耶穌會士書簡集中，就已出現了少數漢字¹⁷；此後門多薩（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的名著《大中華帝國志》（*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Rome, 1586）、衛匡國（Martino Martini）的《中國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 Amsterdam, 1659）等書中也出現了少量漢字的刻印，但真正實現大篇幅漢字刻印的還是在殷鐸澤與郭納爵題為《中國的智慧》的《大學》譯本、尤其是在殷鐸澤後來題為《中國政治道德學說》的《中庸》譯本。他借助中國傳統的木板刻印技術以及身邊中國教友的協助¹⁸，創造性地將中式豎行排版以及西文橫行排版相結合，成功實現中拉雙語文本的印刷刊行。

後來，繼殷鐸澤之後出任“中國差會代理人”的柏應理，前往羅馬匯報教務工作並計劃出版他參與翻譯的“四書”拉丁文譯本，亦即後來的《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但是，受限於當時歐洲還無法實現漢字字模的鑄造，他被迫取消了《中國哲學家孔子》書中漢字的出版——萊布尼茨曾經非常期待該書中漢字的印刷出版，多次寫信詢問該書的出版進度，當他得知漢字部分的出版被取消時，頗為失望¹⁹；門采爾（Christian Mentzel）在他的《拉中小辭典》（*Sylloge Minutiarum Lexici Latino-Sinici-Characteristici*, Nürnberg, 1685）以及《簡明中國編年史》（*Kurtze Chinesische Chronologia*, 1696）中，再次借助木板刻印技術，實現了漢字在歐洲的刻印，但是刻印效果不佳，

傅爾蒙 (Étienne Fourmont) 閱讀後嘲諷這些漢字字形“扭曲”²⁰；巴耶爾在其《中國博覽》一書中的《漢語詞典》部分，借助銅鑄字模刻印了 2,251 個漢字（其中有部分漢字重複出現），但不管是他本人還是當時歐洲的評論家都對這些漢字的刻印效果很不滿意。直至十八世紀後期，伴隨著歐洲字模技術的不斷完善，西文著作中漢字的刻印水平才得到顯著提高。

①Liam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US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66；此後，南懷仁神父在信中也提到：耶穌會在澳門的聖保祿學院沿襲的是耶穌會在歐洲的教育制度，來華耶穌會也曾設想對此進行改革，用中文經典的學習取代對西文經典的學習，但從未實現過，詳見：Noël Golvers, An unobserved letter of Prospero Intorcetta S.J. to Godefridus Henschens S.J. and the printing of the Jesuit translations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Rome-Antwerp, 2 June 1672), in *Syntagmata Essays on Neo-Latin Literature in Honour of Monique Mund-Dopchie and Gilbert Tournoy*,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679.

②孟德衛在其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Honolulu, 1989) 一書第 8 章，對《中國哲學家孔子》所作介紹中提到在 Ricci-Trigault,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ch.4;3) 書中第 344 頁和德禮賢神父 *Fonti Ricciane* 書中的第一冊第 330 頁和第二冊第 33 頁都提到了利瑪竇翻譯“四書”。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一書第 46 頁也談到“一五九三年（利瑪竇）曾將中國《四書》轉為拉丁文，微加注釋。（金尼閣《基督教遠征中國史》，第 578 頁。）凡傳教師入中國者，皆應取此書譯寫而研究之。此書是否印行，抑尚存有寫本，未詳”。

③孟德衛和德禮賢神父都根據自身對文獻的熟悉程度，各自推論出利瑪竇所翻譯的“四書”是 1687 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家孔子》的底本，但是德禮賢比孟德衛更早提出這一點，詳見：D'Elia, *Fonti Ricciane II*, Rom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1949, p. 33; 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p. 250; D. E. Mungello, *The Seventeenth-Century Jesuit Translation Project of the Confucian Four Books, in East meets West: The Jesuits in China, 1528-1773*, USA: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52.

④Lundbaek, “The First Translation from a Confucian Classic in Europe.” *China Mission Studies(1550-1800) Bulletin*, I, 1979, pp.1-11. 筆者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找到了 Antonio Possevino 1593 年在羅馬出版的 *Bibliotheca Selecta* 一書，書中的第九章確實發表了一段來自羅明堅關於德行教誨的文字，文中所引的拉丁譯文來自一本中文書（“Liber Sinensium”，據內容可以明確判斷是《大學》）的開頭部分。有意思的是文中並沒有明確說是羅明堅翻譯了這段文字，但屢次提到羅明堅通過多年對於中國文化的深入學習，最終編成了一本中文的教義手冊。此外，倫貝克的看法可能或多或少受到德禮賢神父在《利瑪竇全集》中所表露觀點的影響。而值得注意的還有：德禮賢神父本人在 1936 年曾經對羅明堅翻譯過“四書”提出過異議。認為以羅明堅當時的漢學修養還無法達到翻譯“四書”的水準。進而推測是羅明堅將利瑪竇所譯的“四書”以及他抄寫該作品的日期一同抄錄下來帶回了義大利。參見羅馬·伊曼努爾二世國家圖書館 (Fondo Gesuitico=FG) 手稿 (3314) 1185 封面上正反面的筆記。可是後來，當他於 1942 年出版《利瑪竇全集》時卻又堅定地指出是羅明堅曾用拉丁文翻譯過“四書”。參見：《利瑪竇全集》(FR) 第一冊，第 43 頁，注釋 2。義大利學者達雷利 (Francesco D'Arelli) 認為現收藏在義大利羅馬·伊曼努爾二世國家圖書館館藏的耶穌會、編者署名羅明堅的 FG (3314) 1185 拉丁文“四書”翻譯手稿其原作者是利瑪竇，至少該手稿中的一至三部分和第五部分的作者是利瑪竇。對該手稿的真正作者究竟是利瑪竇還是羅明堅的探討，迄今還未有最終結論。

⑤關於該書的拉丁文版本，筆者所親見的有兩個：一個是張西平教授從羅馬耶穌會檔案館帶回的 1667、1669 年廣州、果阿合刻本，該書被歸於《西文四書直解》卷中 (*Jap-Sin III*, 3. 3a, 3b)。關於此版本的詳情，參見：Albert Chan,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pp.477-479；另一個版本是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所藏膠片上 1672 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國政治道德學說》拉丁文版，該版本與耶穌會檔案館所藏的版本幾乎完全相同，只是在《中庸》譯文之後還收有 8 頁的拉丁文《孔子傳》，最後一頁也加蓋了殷鐸澤的印章以及 1669 年 10 月 1 日獲准出版的字樣。參見 John Lust, *Western Books on China Published up to 1850. In the library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Bamboo Publishing, 1987, No. 732。可以斷定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所藏《中國政治道德學說》

是一個殘本。

⑥殷鐸澤《中國的政治道德學說》一書所附“作者手記”對書中使用的符號進行了詳盡地說明，比如黑體、斜體、數字，以及中文部分圓圈中的 f.p.§.符號，前文對此已有解釋說明。

⑦對於此書，陳倫緒神父和 Lust 目錄中都有詳細的版本描述，其描述與手頭的這一版本的情況相符。詳見倫敦大學 Lust 目錄第 732 條。

⑧縮微膠片抬頭寫著該版《中國政治道德學說》是 1672 年在法國巴黎出版的，但書中並沒有關於該次出版的時間、地點的文字說明或者印章記號，雖然同年在法國巴黎確實出版了一法文版的《中國政治道德學說》，即 Melchisedec Thévenot 在巴黎出版的著名遊記 *Relations de Divers Voyages Curieux* 中的第四部分，其中也包括了一個譯成法語的《孔子傳》。現不能確定 1672 年在巴黎是否確實再版了殷鐸澤拉丁文版的《中國政治道德學說》，並在同年 Melchisedec Thévenot 也出版了他的法文版翻譯，還是說藏書過程中有誤，混淆了該拉丁文版與更為知名的法文版的出版時間和地點。

⑨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第 331 頁。另外我要在此指出 Liam Matthew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一書在第 134 頁和第 279 頁所犯的錯誤。在第 134 頁作者寫道：“耶穌會最終決定將殷鐸澤於 1662 年翻譯的《論語》和《大學》的合集《中國的智慧》並成一個較大的版本，名為《中國的政治道德學說》，用於東亞的傳教。而該書的兩卷，一卷於 1667 年在廣東刻印，另一卷 1670 年於果阿刻印。”(The first of this work's two volumes was printed at Canton in 1667, while the second appeared in 1670 at Goa, a year after Intorcetta passed through India bound for Europe.) 根據筆者上面對該書的描述，可見這裡有關：殷鐸澤翻譯了《大學》、將《中國的智慧》並成一個較大版本出版了《中國政治道德學說》以及另一卷刻於果阿等的論述都有誤。而在第 279 頁作者再次提到：“《中國政治道德學說》（廣州，1667；果阿，1670）(printed with the title *Sinarum Politico-Moralis*. Canton, 1667; Goa, 1670)”，時間表述上有誤。

⑩北京國家圖書館有該書的縮微膠片，但縮微處索引目錄上寫著該書是 1672 年於法國巴黎出版。筆者也曾懷疑，該中拉合刻本是於 1672 年在法國再版之時，才添加上了後面八頁的孔子傳；但是，基於《孔子傳》最後一頁上有殷鐸澤中文印章以及“1669 年 10 月 1 日在果阿再次獲許出版” (Goae Iterum Recognitum, ac in lucem editum. Die 1. Octobris. Anno 1669. SUPERIORUM PERMISSU.) 這樣的字眼，《孔子傳》1669 年刻於果阿是不需置疑的。另外，鑒於各家對於殷鐸澤此書的版本描述中都沒有提及該書的拉丁文版 1672 年於巴黎再版，因而存在這樣的可能：在編寫索引時，拉丁文版的出版時間被誤記成 1672 年於巴黎出版的法文轉譯版的時間，因後者更為知名。

⑪筆者此處閱讀的版本是德國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Wolfenbüttel 的藏本 (M: Cc 2° 5)，書中明確標明了此處的殷鐸澤譯文在法國再版的時間是 1672 年 (PARISIIS, M.DC. LXXII.)。另外，據 Werner Lümann 介紹，Thévenot 的遊記在巴黎刻印出版了兩次：1672 年第一版的刻印工是 Gervais Clousier；1673 年第二版的刻印工是 André Cramoisy，此人也是《中國哲學家孔子》的刻印工。第二版面世時《中國政治道德學說》一書的封面也被譯成法語。詳見：Werner Lümann, “Die Übersetzungen der ‚Vier Bücher‘ durch die Jesuiten ins Lateinische: Couplet und Noel. Übertragungen in andere westliche Sprachen”, in *Konfuzius. Aufgeklärter Philosoph oder reaktionärer Moralapostel?*,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3, pp. 22-24; Lust 目錄第 260、730 號對該書也有相關介紹。

⑫Lust 目錄第 724 號。該書的原始手稿現藏於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西文手稿部 (Ms. Lat., 6277/1 et 2)，此外該書還有同一時間出版的多個印刷本，現藏於歐洲多個圖書館。筆者親見的印刷本有五個，分別藏於羅馬國家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奧地利國家圖書館、埃爾蘭根大學圖書館和 HAB Wolfenbüttel 圖書館，另外也閱讀了瑞士日內瓦大學圖書館藏本在 Google Books 上的掃描文檔。儘管在出版的時間地點 (1667, 巴黎) 以及書中的內容上，各個印刷本都保持一致。此處筆者是以羅馬國家圖書館所藏印刷本為例 (Collocazione: 13. 11.F.27)，該書使用米黃色軟皮革作封皮，書脊上有墨水書寫的標題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已褪色)，卷邊裝訂，紅色的噴色書邊；此對開本使用那個時代的上等牛皮紙印刷而成，書頁大小為 341 毫米 x 225 毫米，全書頁碼編排為：CXXIV, 108, 21, [3], 159, [1]; XX, 108 [即 110], [10]，書中還附有銅板畫孔子像一幅以及折疊起來的銅板印刷的中國地圖一張。此外筆者經比較發現，雖同為 1687 年在巴黎印刷出版的《中國哲學家孔子》，奧地利國家圖書館的藏本 (BE.4.G.7) 與羅馬的藏本內容一致，但內容上各部分的排

列順序卻略有不同，而且奧地利的藏本為紅色軟皮封面並有卷邊裝訂，金色噴色書邊，在裝訂上更為精美。另外，書中還出現多種類型的頁碼形式並存、部分頁碼排序重疊以及前後頁碼不相銜接的現象，筆者據此推測：書中各部分內容應該是各自獨立排版印刷，之後才又將各部分拼合成書出版的。另外，通過比較歐洲五家圖書館所藏《中國哲學家孔子》的版本，以及與比利時漢學家高華士的通信討論，筆者也發現在十七世紀的歐洲存在著這樣不成文的慣例：當時的“書籍”是以散頁的方式（即處於無裝訂的狀態）出售給買家，售出之後買家可以自己選擇封皮的樣式並按照自己喜好的順序安排書中各部分內容的順序，然後才進行裝訂。這也是現在歐洲多家圖書館所藏的《中國哲學家孔子》書中各部分內容在順序安排上各有不同的原因。另外，丹麥漢學家倫貝克曾出版《漢字的傳統歷史》（*The Tradition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Script. From a Seventeenth Century Jesuit Manuscript*. Denmark: 1988.）一書，書中收錄了他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發現的《中國哲學家孔子》的部分手稿（Bibliothèque Nationale, Fonds Latin 6277），經他翻譯考對認為這些手稿是由殷鐸澤所作、論述了中國象形文字的發展歷史，後來因禮儀之爭的緣故，最終沒有被允許收錄進《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中而遺留下來的殘篇。

⑬筆者此處閱讀的是德國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Wolfenbüttel 的藏本（M: Lf 92）。據孟德衛考證，該書的匿名編者可能是 Louis Cousin，刻印工為 Pierre Savouret。該法文版後來又於 1784 年、1818 年以及 1844 年連同 29 頁的短文“Lettre sur la morale de Confucius”一起於巴黎多次再版；另外，該法文版於 1691 年被轉譯成英文，以“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為題出版，此後又於 1706 年（可能還有 1780 年）再版；1818 年 Joseph Tala 出版了第二個英文轉譯本，題為“The Life and Morals of Confucius”。詳見 David E. Mungello, “Aus den Anfängen der Chinakunde in Europa 1687-1770”, in *China illustrata. Das europäische Chinaverständnis im Spiegel des 16. Bis 18. Jahrhunderts*, Deutschland: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Wolfenbüttel, 1987, pp.67-68. 眾多法語、英語轉譯本的出現，充分說明了《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出版後在歐洲的受關注程度。

⑭Lust 目錄第 83 號。

⑮Lust 目錄第 742 號。筆者閱讀的是 Google Books 上的掃描文檔。

⑯Lust 目錄第 1007 號。

⑰Oskar Nachod, Die ersten Kenntnisse chinesischer Schriftzeichen im Abendlande, in: *Hirth Anniversary Volume. Asia Major, Introductory Volume*. Leipzig, 1923, S. 235-273. 轉引自 Georg Lehner, *Der Druck chinesischer Zeichen in Europa. Entwicklungen im 19. Jahrhunder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4, S. 13.

⑱利用羈留廣州和返回羅馬途中逗留果阿的時間，殷鐸澤將名為《中國政治道德學說》的《中庸》雙語譯本付印，而根據 C. R. Boxer 的記載，協助他刻印的是一名他從中國帶去、洗名為保祿的信徒，在幫助殷鐸澤完成刻印之後，保祿又獨自返回了中國。這位教友應該就是與殷鐸澤一直保持著密切關係的萬其淵，他也是後來在南京獲得羅文藻主教祝聖的三位中國司鐸之一。參見 Nicolas Standaert,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p. 463.

⑲萊布尼茨一直與 Daniel Papebrochius 保持書信聯繫，後者是《聖人通報》（*Acta Sanctorum*）雜誌的編輯，他也是柏應理在魯汶學習神學時的同學和摯友，與柏應理關係密切。萊布尼茨在他與 Papebrochius 的通信中多次詢問《中國哲學家孔子》的編訂及出版的最新情況，此處所涉及的兩人通信內容詳見：Wenchao Li, *Confucius and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in Germany*. 感謝李文潮教授惠賜這篇研究論文。

⑳Georg Lehner, *Der Druck chinesischer Zeichen in Europa. Entwicklungen im 19. Jahrhundert*. S. 17.

作者簡介：羅 瑩，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博士。北京 100089

[責任編輯 陳志雄]